

	隆都公路沿革	余启颖	79
校史之页	中山纪念中学简史	纪中供稿	85
	仙逸中学简史	仙中供稿	91
	榄山书院兴革史略	何仰镐	96
	抗日战争时期的二区救护队	余启颖	99
	旅港中山青年联谊会简史 (转载)	黄联安	105
	在中山游击区流行的 几个游戏	徐 玲	111
断简零缣录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广东省 党部夏令讲习班 中山籍学员名单	柳贱士供稿	113
	民国元年至民国25年 历任县官一览表	凌 辑	115
	读者·作者·编者		118
	补白		
	粤谚征解		25
	刘开泰的绝诗		78
	下期要目预告		98
	县志摘钞·一		104
	稿 约		122

1984
复刊号
总第四辑

复

刊

词

去年九月，全国政协举行了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决定把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作为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搞好这一工作，对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中山政协，在早期曾出版过《中山文史》、《早年今昔》和《解放前的黑暗》三辑文史资料，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停刊。第三届政协委员会成立后，继续征稿，从去年起，又在石岐、小榄、沙溪、三乡等处组织写作组，现在，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恢复出版了。

我们中山，地处祖国的南海前沿，毗邻港澳，对外交往频繁，较早接触到国外各种思潮，特别是民主革命思想影响较深，在民主革命时期，曾涌现了一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如陆皓东、杨鹤龄、刘师复、杨仙逸、徐宗汉（黄兴夫人）、林君复、郑彼岸……等，还有在各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知名人士，如多才多艺的爱国诗人苏曼殊、中国现代音乐鼻祖萧友梅、教育家钟荣光、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岭南乐派代表、名音乐家吕文成……等；在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曾任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杨殷，

与孙中山是翠亨村的同乡。以上都是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当然还有不少不大知名、但同样对祖国的进步作出了贡献的先进人物，则有待于我们继续收集，作为教育后一代的爱国主义教材，发挥文史资料的作用。

文史资料，也可写一些反面人物，从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中，可以反映着时代和社会变幻的风云，使人们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有更加形象的认识，也是一种反面教材。

我们中山由县改为市后，如何成为新型的经济区，是一项重要的课题。过去老一辈的实业家，对于兴办实业，发展经济是有一套好经验的。解放前，省港驰名的大新、先施、永安、真光等四大公司，都是中山人创办的，又如岐关、谿叠车路，迪光发电厂……等，都是经过艰苦创办的。还有，老一辈的华侨、港澳同胞，他们离乡背井，飘洋过海，艰辛创业，不少成为富商巨贾；他们的子女，也有不少是学者专家。现在，回顾和总结他们兴家立业，培育人才的过程，写成资料，对于我们发展经济，勤劳致富，引进先进技术，都很大的启发作用。

综上所述，收集和出版文史资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要把这一工作做好，必须把它放在应有的位置，除了我们政协委员以“抢救历史”为己任，大家开动脑筋，动手撰写之外，还可以动员亲友、同志和广大群众，进行收集和撰写。这里潜力是很大的，我们一定可以同心协力做好这一工作。

在这次复刊中，我们编辑组因限于经验和水平，不足之处，有望于政协各同寅以及各界热心人士，给予指正；并望大力支持，以期把这一刊物办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优良品种。

中山报业史略

芷 轸

我县之有报馆，始于民国纪元前四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908年），系邑人郑岸父（彼岸）、李怜庵，联同就读广州主张革命的同志所创立，每十日一期，名曰《香山旬报》。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我县第一份具有革命色彩的报纸。

郑岸父自任编辑兼发行人，其胞弟自强（建初）任督印，而主持笔政者，论评以李锐进、郑道实担任最多。亦遑、愤血、民声、使戈等，均李君笔名；闇微、讽一、亦讽、求是等，均郑君笔名。文艺、译述、杂录等，则以黄冷观、杨子毅、秦侣尹、毛仲莹、余晓峰、曹纯武、林继昌、林冠廷等为多，亦间有担任论评。

该报纪元，不用清室年号，只署年干，其倾向性已非常明显，而该报一问世，便让邑人读到这样的一篇不同凡响的《发刊词》。

“中华开国四千六百有六年，岁在戊申八月之二十一日，我《香山旬报》出世。本报同人惧小雅尽废而中国亡，咸抱大悲，发无边弘愿，为欲令邦人士女，拂拭真智，咸革旧染，兴风厉俗，作我民气。因以恢复自由，振大汉之天声，发扬我邑人耿光，被于中土。乃笔勉而作斯报，扬海潮之音，为

民道译；美满光大，将自今始。我先民陈天觉、马南宝诸公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呜呼！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凡我仁、良、隆、黄梁、得、能、四、大、黄圃、恭常、谷、榄、旗十三都五十万诸父老昆弟姊妹，庶奔走偕来，听我法音无怖。”

虽因在县城石岐发行，措词未免稍有顾忌，然鼓吹革命宗旨，已昭然若揭。时革命志士刘师复因图炸水师提督李准被捕，解回县狱，然亦时有著述，用寥士、抱蜀、净慧居士、寒柏斋等笔名，在该报发表，影响颇大。

该报出版至第四十六期，因邑人徐桂冤狱，岸父北行营救，由李怜庵代理编辑兼发行人职务，至第八十三期（辛亥正月），改为每周出版一期，名曰《香山循报》，出至第一百二十三期止（辛亥九月十七日）。

辛亥九月十六日，本县光复。先数日，循报已决定改为日报，名曰《香山新报》，在十七日出版，郑道实任编辑兼发行人，提倡革命后的建设事业，介绍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出版约一年，改名《香山纯报》，由黄冷观任编辑兼发行人。

继《香山纯报》之后（约在民元前二年），石岐有《铁城报》出版，系黄芷裳、刘天牧所办。辛亥六月，就读广州同人中，还创办《香山月报》（比循报还早），由李澧川任编辑。两报均曾风行一时。

到了民国四年，郑彦闻、郑哲园等创办《仁言报》，中间一度曾改名《大同报》，旋复旧名。民廿二年（1933）由隆都人张浪石接办，执笔者有张稚庐、张楚弓（均浪石之子）、肖放诗、肖汉宗等。民廿四年（1935），由股东推举肖汉宗任总经理，张浪石任经理兼编辑。此报历时约卅二

年，为前此县报的最长久者。

民国九年（1920）五月间，《萃粹旬刊》出版，主办人张浪石、张稚庐；执笔者有肖放诗、杨棣棠、程祖培等。张与程都系邑中中医，故该刊颇注重研究医学和中国医药。

民国十年，有《香山公报》问世，主办人萧汉宗、张骥甫；翌年停刊。

约在同一时间，又有《新声报》、《铁声报》和《民报》出版。当时陈炯明主粤政，提倡“民选”县长，吴铁城与陈永安竞选，《铁声报》、《民报》拥吴，《新声报》拥陈。报纸早已成为派系斗争的工具了。《铁声报》初为周刊，后来改为日报，白缪耀枢、黄弥谦、刘钧韶和程伟仪等所创办，浪欧主编。（实则由缪耀枢负责编辑）《新声报》由黄兆崇创办，《民报》的主编是陈铸魂。三报以《新声》寿命最短，《铁声》较长。

稍后有《求是报》，系月刊，主办人李微尘等，颇致力于提倡无政府主义，但出了两期，便告夭折。

民国十四年（1925），中山县商民协会成立，同时创办《商民公报》，执笔者有张稚庐、张浪石、萧放诗、萧汉宗、萧杰三等。

同年又有《平民日报》，还是萧、张那套班子，主办人萧汉宗、张浪石，执笔者张稚庐、萧放诗等，出版半年后停办。

约同时又有《商报》，执笔者潘仲吉、黄密弓。

又有《岐江晚报》，办报人未详。

民国廿二年（1933），有《大公日报》出版，主办人为黄达孝、黄学崇等。

此后（卢沟桥事变前），我县又有《民国日报》出现。

那是国民党的机关报，直接由省党部领导，其与县党部的关系是既有矛盾又能合作的。中山沦陷后（甚至在前一段时间），该报随国民党政府的流亡而停办。直至日寇投降，劫收大员翩然莅止，《民国日报》便重新开张。就在张惠长卷土重来再摄县政的同时，隆都人刘次修也攫取到县党部书记长的地位；并用萧君若为《民国日报》社社长。曾经毕业于“县中”、成为反动校长林卓夫得意门生之一的高宗保做了县党部的执委，还当了《民国日报》的总编。刘、萧、高三人相处得蛮好，共同请出了刘应章、刘稚良二人为编辑。半年之后，刘次修被挤走，郑冠英上台，并推荐萧秉权取代萧君若，做了第二任的《民国日报》社长，高宗保、刘应章、刘稚良三人则仍留任。但不久，他们几个与萧秉权合不来，溜了。总编一职落入刘鹤朋之手。

刘鹤朋在抗战期间，原为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扫荡报》班的负责人，随军在南宁工作，后离职去肇庆，遗缺由林凤祥（也是本县人）接任。林在抗战胜利后随一五九师（师长刘绍武）来中山，林的《扫荡报》在石岐出版，并公开发行。1947年，一五九师被调离中山，林亦离中山赴穗，不再搞《扫荡报》了。时适刘鹤朋从肇庆回岐，知林要离开，便接了《扫荡报》的家什和一些工作人员，同时筹借经费，继续办报，定名《建中日报》，自任社长兼发行人，梁彦当总编辑。由于营业不佳，资金花光，迫得顶手。刚好萧秉权要找人，便把刘拉去做了《民国日报》的总编。

《建中日报》由郑祖德、张汝翱、刘宇光等接办，仍以刘鹤朋挂名为发行人，郑祖德、张汝翱分任正副社长，由刘宇光担任编辑。不久又先后续聘董伦、陈宏文（中山民盟早期组织者，并曾兼职于县修志处）等任总编。1948年，郑祖

德升任县党部书记长，社长便由陈国权接充（陈宏文转去《开明报》），陈任用刘宇光当总编辑，赖志衍（盟员）当副总编辑，刘树军当采访主任，记者有李宗龄、林早耀、李天泽等。

早在《建中》之前（约在1947年三四月间），隆都人高岱等办了一个《开明报》，目的在于扶植地方势力，与《建中》分庭抗礼，但有心无力，搞不出“成绩”来。而民盟在县上已有工作基础和较好条件，便通过一定关系，接办了该报，由盟员郑沧微担任社长，并把陈宏文从《建中》拉了过去当总编。同时该报还接收了原有一些人，并续聘黄民本、林凤祥、方立维、郑贵清等来工作。

中山解放，《建中》还出版了一段时期，其余两报，则早已先后停办。

当时在石岐，还有一些通讯社。有个“新中通讯社”，设在民族路口的“建国洗衣店”楼上，其主办人是余绍尧、梅鸿杰等。他们与广州的《建国日报》是一个系统的，担负着某种政治任务，但中共地下党员许平，却以该社记者的公开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干得很隐蔽，也很成功。

我县是1940年3月日寇第二次入侵后全部沦陷的，历时六载，报业简直没有了。但在石岐却出现了《迅报》（社长刘传能，在广州出版）《西南日报》这样的东西，群众叫它做《汉奸报》，不屑一顾。

然而，真正的人民报纸，却在艰苦岁月中诞生。

第一份革命报纸是《民气》，用八开白报纸两面油印，以登载通讯为主，也有社论或专论。该报在岐郊出版，后迁入山区。虽是油印小报，却是名符其实的“纸弹”，敌人极力追踪它，群众却欢迎它，千方百计要得到它。

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成立以后，办了一份县级报纸，名曰《新中山报》，用四开白报纸两面油印，四大版。报头“新中山报”四字是由珠纵司令员林警云签署的，出版了十期左右。

沦陷期间县上还流行一份《正义报》，是大型油印报，跟普通报纸一样大，四大版印两面。这是珠纵出版的，不属于本县系统，从略。

（一）该文前部分系根据前中山修志处副主委郑道实所写的《中山报业史略》一文增补而成的，标题照旧。有关沦陷期间的报纸，另有专文纪述，此文不予详写。

（二）《香山旬报》发刊词，标点为笔者所加。

（三）李怜庵之子李自由，曾将《香山旬报》百多期送给县修志处。解放后，修志处全部志料由军管会接收，该报亦由军管会保存。

（四）我县民间，有大量刊物出版，如乡报、侨报之类，抗战期间，旅港乡人亦有抗日报刊出版，如《今日中山》之类。对这一史实，笔者将另文纪述。



——笔者附志

我县沦陷时期人民出版事业回顾

铁笔记者

宣传工作做得好，就是革命成功了一半。

——列宁

说起人民出版事业，人们首先要想起的，也许是今天那些每日出版量超百万份、用自动卷筒机印刷的各大报纸和那些内容丰富多采、封面花样百出、最为人们所爱读的各种期刊；但本文所写的不是这些。出现在本文的不外是针笔、油墨、钢板而已；再有，就是党在艰苦岁月坚持把纸弹作炮弹来进行对敌斗争的那种奋斗精神。

中山党把出版工作放到对敌进行宣传攻势、对内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地位上来，应该说是从“抗先”被停止活动、革命力量转入地下斗争的那时候就坚决贯彻，而这一决定又是非常明智的。那时候，党经过整顿和初步巩固，县委组织也重新调整过来。原是县委书记的孙康调离后，由梁奇达任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黄峰任宣传部长。

1939年冬，党便把原在抗先县队部负责秘书处工作的郑振撤到右岐近郊的起湾乡，负责出版工作，以教书职业为掩护，同时与另外两位教师（杨兆华和黄淑文）一起过组织生活，而由黄峰直接领导。由于该乡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杨兆华又是本乡人，在乡民当中颇有威信，与上级领导机构联系

也方便；选择这么一个地方来搞出版，无疑是适宜的，工作起来，还是比较顺利的。

黄淑文住在乡人二叔母家，我们的“机关”就设在黄所住宿的楼上，相当安全。声讨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抗先的《告全县父老兄弟姊妹书》、《告海外侨胞书》等一部份文告，就是在这里刻印的。

但不久，我县沦于敌手，石岐已成为敌伪统治的中心。斗争形势有所变化，党的力量不得不逐渐向山区转移；我们的出版机构也在1940年四月撤退到山区（当时还属四区范围）去。

领导这一出版机构的仍是黄峰。他来跟郑振联系的时候，也就是郑振过组织生活的时候。

通过组织关系，郑振在白企乡校做教师。学校规模不大，只办初小，学生不足一百。校长（似乎有个挂名的）、教员、工役的一应职责，集于郑振一身。就是这么一个中山党早期的新闻战士，在这座小祠堂里，建立起我们新的出版机构，印出了第一个期刊。

这是偏于理论性的期刊，命名《横门》，篇幅不大，每期只发表三几篇文章，谈的是有关政治形势、思想修养、对敌斗争之类的问题，其任务在于唤起同志们的阶级觉醒和民族意识，揭露敌人的侵略本质和残暴行为，激发沦陷区群众的民族正气和斗争精神，宣传范围不广，意义可很大。

由于革命从高潮转向低潮，反动统治从蒋记顶手给汪记，可以肯定，我们的同志和群众将要经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未必经历过的艰苦岁月；如何认清形势，坚定意志，站稳立场，苦干到底，这是当时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党抓住了这一点，首先就在第一期《横门》上，发表了《讨伐

汉奸县长欧大庆》这一历史性文告，接着一期发表题为《论气节》的社论，并围绕这一主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既谈理论也有实例的文章；同时还翻印或摘录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平时很不容易读到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烈士传略》等好几种小册子。这固然对我们每一个同志和广大群众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而对负责编印工作的同志来说，更足以使他首先受到教育，使他懂得逐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并以先烈们的自我牺牲精神来鞭策自己，从而有利于革命实践和自我改造。

每天一下课，郑振便躲进小楼，拿起钢板和针笔，来干他的正业了。那座小楼，就在教导处的后半部，用来做教师的寝室固然不错，可它也是党初期的油印室、甚至是报社，那就未免有点寒俭了。不过，这就是历史，就是现实。党的第一批比传单的技术要求较高一点的纸弹，就是在这儿生产出来的。哪时要编写中山党史，可不要忽略了这个地方！

小楼低矮而狭小，没有窗户，纵使是日间也很幽暗，只有一个不到五寸见方的“天窗”漏下一道光线来。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就搬一张书桌放在“天窗”下面，利用头顶光来刻印。

付印多在夜间。一个人搞，要油印，又要钉装，比编和刻更花时间。组织上是了解和关心这种情况的，所以，常常派一位女同志来帮忙。她叫许纯，四区泮沙人，年纪轻轻的，很吃得苦。她来了，我们的“印刷机”就运转自如了。一个扫油，一个执纸；一个叠纸，一个落钉。流水作业，不到天亮，一册册的《横门》就钉装好了。于是立刻，或者等到天亮以后，就由许纯、或者组织上刚好派到的交通员简洁和孙继明等，把印件秘密运送到各区去。

有时组织上没派人来，郑振就只好包办编印钉装全套工序了；但无法搞运输，管发行，惟有让产品暂时掩蔽一下；或者塞进埋在隐秘角落地底下的瓷缸里，或者放进墙壁高处的扁额里，小书就藏在风琴里。这样的“保险箱”，其实并不保险；幸而没出过事。

为了迷惑敌人，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得不要点花招，在印刷形式上力求多样化，字体经常改变，使用多种笔名。

《横门》出版后一段时间，又编印一个也是32开本的《谷种》。这样，使人看起来，共产党搞这东西，不是三两个人，可能是十个八个人，出版机构不是一个，起码也有两个或三个。

我们的纸弹，显然已经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并已经成为敌人追索的对象了。

学校所在地离敌伪力量较为集中的南萌不远，当然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果然未满一个学期，有一天，学生向老师报告，校外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在巡来巡去。郑振警惕起来了，立刻收拾起必要的东西，秘密撤退到邻村贝头里去。几小时之后，敌伪的侦缉队就闯进学校搜查。搜不出什么，便拿走一个铜钟。这次虽没受到大破坏，但学校因而停课，出版机构也不得不转移，损失可也不算小！

郑振被调去石门九堡（当时属六区），填补事先从一所小学调走一位教师而留下来的教席。校内还有一位男教师杨维学，翠亨人，不在校住宿，每天放晚学后回家去。学校设在田野上，四围都是田，正所谓“前不把村、后不把店”，平时很少人米，环境僻静极了！

这一地下“报社”，工作条件比白企好得多。别说工作室可以得到充足阳光（不是小“天窗”而是米多高的大窗户

了），就是工作时间也较充分。在白企，郑振一身兼记者、教师、工役（要自己弄饭）几重身份，而今，学校居然有一位校工，为学校煲茶水，搞清洁，也为老师弄两餐，这就无异于给我们的出版机构，配置了一个勤杂人员。在长期的艰苦生涯中，这段时间，郑振说得上是幸运儿。

更使我们的新闻战士大喜若狂的，竟有一天，给郑振在“深山穷谷”中发现了宝藏！在一个讲坛里面，不知哪一位我们的同志掩蔽了满满的一大批书：《联共（布）党史》啦，《论持久战》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啦，《列宁主义基础》啦，《进一步，退两步》啦，……全是理论书。好家伙，这是跟枪枝子弹一样重要的东西呀！这个发现，不仅给郑振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给我们的出版机构添置了一个图书馆。郑振工作得更使劲，学习得也就更加废寝忘餐了。

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暂时停办了《横门》（也即是《谷种》），改出影响更广泛的小型报纸，那就是党在沦陷区出版的第一份报纸，以《民气》为名，以广大群众为对象，用八开的形式印两面，每期都有社论和新闻报导，还有其他方面如短评、杂文之类文章。内容较为群众化了，印数增加了，宣传面更广阔了，尤其是那时我们的武装力量，已在各地活跃起来，出击敌伪的胜利消息，也常在《民气》上刊载，这是群众最感兴趣的。因此，《民气》在群众当中逐渐树立起威信，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群众经常向被认为“同志”的人要《民气》报看。没看完就珍贵地收藏起来；看完了就很郑重地转给他们认为可靠的乡里和亲友。一张《民气》报往往传阅了好几十人，纸张霉烂了，字迹模糊了，还在不断传看。

这时领导这一出版机构的仍然是黄峰，而与郑振联系得较密切的则是县委派来的邝叔明（男，八区小濠涌人），稿件大部分是由他带来，同样，党的指示，工作的安排，各地区的工作动态，以及敌伪方面的活动情况等，也通过了他传达到这个工作点来。

要是报纸刚好印完，可以“发行”了，有时也由他带一部分走。

郑振虽则常常一个人在工作，但他丝毫没感到孤独和寂寞，他的脉搏总是时刻跟党、跟自己的同志跳动在一起。

所有印刷品，通常都是由组织派出交通员运送到各地去的。他们或则扮成商人模样，肩上挂上布伞，少量的东西就裹在布伞里；或则挑着一担箩，化装卖咸鱼的，箩里面就藏着一叠叠一卷卷的报纸和刊物。黄旭当时也是交通员，曾经为我们出版物的输送工作尽力不少。

印件给运走了，想象到它会给我们的群众带来无限兴奋和希望，也会给这里的一撮日寇、那儿的一股汉奸造成无形的纷扰和袭击，我们的新闻战士笑了，整天从晨到夜由于十多小时的工作和学习所形成的极度疲劳，也就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在白企和石门那期间的出版物，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以外，还曾翻印过党的整风文件如《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等，都是用小册子的形式出版的，这对43年中山党开展党内整风运动起到一定作用。

“皖南事变”震惊和激怒了中山县委，黄峰曾立刻赶到石门，跟郑振一起编印出一本小册子，揭发和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并且仿制了周恩来同志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煮豆燃萁，相煎何急！”这悲愤的诗句做封面。

我们的出版事业是逐步向前发展了，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但是，谁也没有忘记，石门的自然环境，即使比白企更利于工作；可沦陷区毕竟是沦陷区，特别是石门比较接近公路，与驻有日军的翠亨村更相隔匪遥。伪军、以至“萝白头”也常会窜来山区骚扰。曾经有一趟，就有两个“萝白头”骑着高头大马，向着学校取道而来。郑振在楼上望见了，作好了应变的准备，照旧跟学生上课。原来敌人是来向学校借东西的。语言不通，他们倒会画图，看图样借给他们几张学生用的书桌他们就走了，总算没发生什么凶险。又有一趟，石门受到伪军骚扰，群众夜间不敢居家，暂时找地方躲避。郑振也不便留在校内，但他准备向哪儿掩蔽呢？他找到个好去处。在杨维学离校时，他们一起回翠亨。杨返家，他却偷偷地躲进纪念中学（早已停课，而日军却不敢进驻），找到一间较隐蔽的小房子，躺在一张破理发椅上，睡了两夜。

也许这样的经验是相当宝贵的：在敌人眼皮底下掩蔽（甚至活动），的确比较“安全”。

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县上有好几个区那时都出版了油印报。比如一区的《光明》，二区的《联防导报》，三区的《正报》，八区的《黄粉山》，相继产生，其内容和形式也跟《民气》差不多，地方性比较突出。我们的出版事业显然是从集中到分散，而且都根据各自的特点和条件发展了。但是，这些报刊印发册数都是不多的，有时因人员调动就不得不中断。另外，这段时间，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以广游二支队的名义出版《正义报》，那是一份大型油印报，一张大白报纸，印两面（有时也出小报张），内容丰富，很吸引人，中山县各区都有散发到。

一九四四年，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成立，我们的出版事业又重新集中起来办，而且以空前活跃的姿态向前发展。

行政督导处是直接受珠江纵队领导的，相当于县人民政府。筹备期间由叶蔚文主其事；到亮出招牌的时候，县上各乡张贴了大张油印的、盖着大印的布告。负责人是阮洪川、曾谷、张诚美等。阮当主任，曾抓文教。为了推动抗日民主政权的开展，党决定在行政督导处领导下，成立一个报社，出版报纸，把正在滨海区工作的郑振调回山区负责报社工作，由曾谷直接领导。

由于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人民出版事业规模更大，工作也更顺利了。我们那时不是只有一二人工作，而是一群人的工作；不是以教书为职业来掩护工作，而是以革命为专业了。工作之始，我们建立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油印室，配备了掌握一定的油印技术的人力（负责油印工作的当时有甘正松，甘鼎汉、甘岳雄等），同时积极筹备报纸的出版。不久，中山第一份县级民主报纸问世。报名定为《新中山报》，是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亲笔题字，还有他的署名，用红色套印。报纸的版式比《民气》大一倍，两面印刷。

报社除出版报纸外，还编印了一些小册子和传单。

形势不断发展，报社的工作人员也由开始的五六人，增加到五桂山上遍地红旗时的三四十人。党在群众当中已经拥有极高威信，不少青年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渠道，奔集到党的旗帜之下，参加了革命工作（平原地区的群众称为“山坑”工作），报社的力量因此得到壮大。

报社办了个学习班，让他们进行政治学习和油印技术练习。大家过集体生活，（分别住在群众家里），每天都有文